



# 洋务教育改革与明治维新教育改革之比较

胡茂波<sup>1</sup>, 黄 冀<sup>2</sup>

(1. 华中科技大学 教科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2. 武汉市东胡中学, 湖北 武汉 430071)

**摘 要:** 本文对洋务教育与明治维新教育在改革的目的、改革的指导思想、改革所形成的体制三个方面进行比较研究, 以探究中日两国改革结果不同的原因。这对我国当今教育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 洋务教育; 明治维新; 教育改革; 比较

中图分类号: G5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31X (2005) 02-0008-05

1860年开始的中国洋务教育改革与1868年开始的日本明治维新教育改革, 分别是中日两国教育近代化的起点。当时两国改革的时间和所处国际环境十分相似, 但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结果, 这主要是教育改革目的、改革的指导思想、改革所形成的体制不同而造成的。本文就以上三个方面, 将洋务教育与明治维新教育改革进行比较, 以探究这两次教育改革所形成不同结果的原因。

## 一、教育改革的目的之比较: “师夷长技以治夷”——“文明开化”

当时中日两国都面临着西方列强的侵略、国内社会动荡不安的局面。在中国清政府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 国门被打开。国内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刚刚被镇压, 社会局势动荡不安。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形成两个政治派别: 顽固派和洋务派。洋务派的代表是奕訢、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以及稍后的张之洞等。从阶级性质来看, 他们都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出类拔萃之辈。奕訢乃皇室成员, 是清道光帝第六

子。他从小生活在皇宫, 受到严格而又特殊的封建教育。他在1850年咸丰帝登基后被封为恭亲王, 1853年转任军机大臣, 不久又任都统、宗人府宗令、内阁府大臣等职, 是当时权重一时的铁腕人物。曾国藩出生地方豪族, 自小诵习五经, 埋首时文帖括, 28岁时会试中进士, 经殿试, 获同进士出身, 之后参加朝考, 致翰林院庶吉士, 经散馆学习, 考到二等十九名, 被留在翰林院供职, 翰林七年, 曾国藩按理学家修身养性之条规, 刻苦攻读, 历次考试成绩优等, 由七品的翰林院试讲一直升迁到从二品的内阁学士。在太平天国风起云涌的局势下, 他忠心耿耿效忠于清廷, 以镇压太平天国的功名名播朝野, 奠定了他在清政府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李鸿章的科举生涯也是一帆风顺, 由举人、进士到庶吉士, 时年24, 少年高科。他在翰林院师从曾国藩, 自后官运亨通, 飞黄腾达, 是继曾国藩之后的又一位炙手可热的权臣。左宗棠21岁中举人之后, 会试屡试不中, 只好在地方教书为业,

收稿日期: 2005-01-13

作者简介: 胡茂波 (1975-), 男, 土家族;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高等教育财政研究。

后经人推荐，才进入仕途。在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的过程中，为清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以后又在恢复新疆，抗俄、法侵略者中屡建功勋，使其成为颇有声望的封疆大吏。张之洞自幼研习封建旧学，洽闻强记，淹灌群书，二十六岁中探花，赐进士出身，授翰林院编修，从此步入仕途。从以上可以看出，奕訢、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都受封建统治思想熏陶，从思想上到行动上都是立志维护封建统治的地主阶级代表。但是近代中国外患内乱，又使他们身不由己的接受了有悖于传统的西方科技，承担了本来不属于自己的历史使命，奕訢说：“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以制器为先。”<sup>[1]</sup>洋务派就是在“自强新政”的口号下，兴办起洋务事业，开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进行洋务教育。但他们是容不得任何诋毁封建礼教的异端存在的。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讨粤匪檄》中，对太平天国奉行西方的上帝深恶痛绝。他说：“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然，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民教之变，我孔子孟子痛苦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无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然而当外国侵略者用炮舰轰开中国的大门，以轮船大炮耀武于“天朝大国”之中时，双方差异的悬殊使他们“四更成眠，五更复醒，念（夷人）纵横中原，无从御之，为之忧悸。”<sup>[2]</sup>这种由仓惶失措而萌发的危机感，使他们又不得不屈从于有碍“夷夏之大防”的西方文明了。尤其是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他们“借师助剿”，这不仅承认了西方科技的优势，而且也从中萌发了“将来师夷智以造船炮，尤可可期永远之利”的念头。洋务派这种矛盾的心理状态，来源于他们对西方科技的无可奈何，又来源于他们对中国旧文化的真诚留恋，因此他们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是“中体西用”。只学习西文、西艺，而不习西政，学习西艺的目的也是更好的维护清王朝的统治。

19世纪中叶，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日本出现了三种反对幕藩制度的社会力量，农民，商人、地主和批发行资本家，下级武士，革新势力日益壮大，出现了一批眼界开阔、要求变革、实行近代化的先进人物。与此同时，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向亚洲扩张侵略，打开了日本闭关锁国的大门。这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内部的动荡不安。1868年1月3日倒幕派发动宫廷政变，建立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天皇制国家政权，实行资本主义改革。明治维新推行“文明开化”。“文明开化”的涵义不仅是从西方引进先进的技术，而且要以西

方资本主义近代化为榜样，学习西方的文化教育、文物制度，这种思想和教育观是幕府末期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西村茂树、森有礼等人积极宣传的结果。西村茂树当时是一位热情支持西化的哲学家，他吸收了密尔和奎鲁特的思想。关于文明的含义，他于1875年宣扬：“文明”的含义应从群体关系和个体品行的进步及发展方面来把握，而不能仅仅从财富、能力和权力等方面来把握。尽管从整体上讲，这个国家在走向繁荣，但如果人民的才智没有一点进步，这种繁荣将不可信，因为繁荣的源泉一点不明确……除良好的教育外，没有达到这点的更好的办法……为了有效的使人们之间有良好的社会交流，教育是提高道德水准、开阔知识视野、增加整体上人民的幸福的重要因素……更进一步说作为提高大众文明水平和带来臻于完善的社会交流条件的最好方法，在效率上没有什么能与教育的力量相媲美。（《“文化”的一种解释》第36页《明六杂志》）。森有礼是另一位明治早期思想家。他于1870——1872年作为新明治政府的使节去美国，这时他第一次认识到兴教能使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关于在一个现代化国家的社会生活中教育的地位问题，森有礼说：“我的经验告诉我，正是一个国家的教育体制最终完好的保证了他的人民的权力，因此我们必须提高全体日本人民的文化水平，为了这个目的，各种有用的知识都必须发展。通过对在全国传播科学和技术知识提供必要支持，政府能够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最有效地完成它对人民的教育责任。进一步说知识不应局限于一个特殊的阶层或某一种人，而应该传授给全体人民……只有这样国家才能根除愚昧、无知这些常常导致人类不幸的因素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才能为和平文明的民族生活方式打下基础。”<sup>[3]</sup>森有礼在这里表白的思想不是一个寂寞思想家的苦思冥想，而是明治政府领导者中正在形成的有关教育的见解的一致表达。木户孝勇是一位明治政府维新的领导人，他的见解也是相同的，他说：“为了我国的独立和强盛，我们需要一个广泛的启蒙，需要人类知识的最大限度的发展，我们的学校要为孕育这些必要的天赋和能力承担重要的责任。用富泽谕吉的话来说：文明必须在‘大众精神进步的鼓舞’下才能逐步实现。”<sup>[4]</sup>由此可见，这些明治早期思想家和领导人已经要改革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以提高庶民的知识技术水平和启迪民众的智慧，使民众的头脑都得到文明思想的洗涤，在全社会形成文明的风气，从而达到富国强兵。

## 二、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比较：中体西用——和魂洋才

洋务派教育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不触及封建守旧的政治体制，这就导致了洋务教育目标是能够培养出既具有儒家纲常名教的思想和品德，同时又能运用西方的科学技术并能从事洋务的人才。李鸿章所论具有代表性，他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洋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sup>[5]</sup>这就是说，中国文武制度的“体”最好，不需要变更，只是船械火器的“器”不如西方，要向西方学习的只是西学西艺，为我所用。到了洋务派后期，张之洞将这一指导思想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明确表达出来，并加以系统化、理论化。张之洞在《劝学篇》中认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以“旧学为体，新学为用”要新旧兼学，不可偏废，不能增新替旧。他说的“旧学”是指“‘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所说的“新学”，是指“西政，西艺、西史”。至于他所说的西政、西艺，他也有具体解释，指出：“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可见他所说的西政，并不是指的西方制度，而是学校、地理、度支等教育、交通、财政等行政措施。至于“西史”他虽未作解释，也只能与“旧学”中“中国史事”相对而言。可能是西国史事之类，这可算“西学”中不太重要的部分，无关宏旨。张之洞认为“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以中学固其根底，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sup>[6]</sup>可见洋务派学习“西学”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所学的内容也只是技艺和西方的经济、军事、财政、文教方面的一些具体措施，而没敢触及到西方资本主义政体。洋务派要把儒家封建礼教的三纲五常作为政治思想的主体，也可称之为“道”。

在进行“文明开化”过程中，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发生了激烈的冲撞。怎样处理这一问题，日本明治维新的思想家们提出了“和魂洋才”。1854年，荷兰学家兼诸子学家左久间象山就提出了“东洋道德，西洋艺术”；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后，明确提出了“求知识于世界”。富泽谕吉对盲目推崇西方文化，忘记了民族独立，给予尖锐的批判。他说：“那些庸俗的西方学者，在完全没有认识到日本所面临的危机，也没有对此提任何解决办法的情况下，就把西方文化强加于日本。他们那样的盲

目的相信西方的东西，而怀疑东方的东西，是多么浅薄！”<sup>[7]</sup>可见“和魂”是指日本固有的民族独立精神。洋才是指在坚持日本民族独立精神下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日本的一位史学家曾自豪的说：“日本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外国的文化和思想，非但没有异端感和偏见，相反能以外国先进文化和思想为师，优先全力移植和吸收，这是日本人民的传统素质。”<sup>[8]</sup>“和魂洋才”的思想表露无遗。“中体西用”和“和魂洋才”的教育指导思想在洋务教育改革和明治维新教育改革的实践中有其相似之处，但区别却是重大。“中体西用”中的“中学”是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礼道德，是“道”，是不可更改的。“西学”虽在一定程度范围类扩大，但其也不可能涉及到西方资本主义的政体，只是文、教、卫的具体措施，是“器”，是为维护封建统治而服务的。“和魂洋才”中的“和魂”是以儒家道德为基础的个人伦理，源于近代西方道德的社会伦理和国家主义的国家伦理三者的结合。“和魂洋才”强调东西方思想的融合，具有兼收并蓄的意味。

## 三、改革所形成体制的比较：新式学堂 新式学制

洋务派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先后创办了30多所新式学堂。在这些学堂里，洋务派注意引进了西方的教育体制，努力把教育与洋务运动的需求相结合起来，大都是实施“方言”教育、“武备”教育和科技教育的。如京师同文馆，就是在与外国列强的交涉中深感“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因而“受人欺蒙”。尤其是《天津条约》第50款条文规定：嗣后英国文书，具用英文书写，仅在三年之内，可以附有汉文配送。这样的条件下设立的新式学堂创设之初是为了解决清政府需要“通事”和“译员”的当务之急，在此目的下京师同文馆的课程侧重于“西文”和“西艺”，并采用西方的教学制度，实行了分年课程和班级授课制，这比封建传统学校的个别教学制是前进了一大步，但洋务教育始终未能形成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自上而下的新式学堂的推广普及运动，各学堂均隶属于地方有关厂局机构，学堂规模小，分布不均匀。如福建船政学堂就是因福州马尾设置船政局而附设，广东黄埔鱼雷学堂就附设于黄埔鱼雷局等，并且这些学堂大都分布在沿海有港口的大城市里，分布在内陆和中小城市里的甚少。整个洋务教育改革尚未形成统一的规模和学制，教育发展呈一种分散自发的状态。洋务派所兴办的新式学堂都由于洋务派官僚在进行洋务实业运动过程中根据需



要而设立，由各地方政府官僚进行管理，没有形成统一的管理模式。经费由地方政府官僚自行解决，中央政府没有形成统一的经费保障政策，这就使得经济落后的地区，新式学堂难以设立，并且所设立的学堂规模也较小，更为致命的是新式学堂是作为一种新生的事物依附在旧体制上面。洋务派在布新中未除旧，它对全国的教育机构、体制未造成冲击，这个中国教育体制还是旧的教育占主导。

在“和魂洋才”的指导思想下，日本明治维新教育改革全面吸收西方的教育体制，于1871年7月创设文部省，在1872年1月制定出《学制》，8月3日正式颁布《学制令》。学制第一章就规定，全国学校由文部省统一管辖，这样使中央集权的教育体制形成。学制第二章至第七章将全国划分为八个大学区，每区设一所大学，每一大学区分为32个中学区，每中学区设中学一所，每一中学区分为210个小区，称为小学区，每一小学区设小学一所。中学区以下由地方官因地制宜而划分。学制第八章至十四章规定，每一中学区设学区督学十至十二、三名，并就有关督学的任命、人选、工资、职责进行了规定。十五至十九章规定，在每所大学本部设一督学局，其中设督学一人，附属官员数人，并就督学局的职责和地方的关系作了规定。这对明治维新教育改革政策实施提供了有利的保障。学制第二十章规定，学校分大、中、小学三等。第二十一章至三十九章规定了小学、中学、实科学学校、师范学校、大学的课程内容、招生对象。四十至四十七章就有关小学、中学、大学教员的教学资格及其管理作了规定。如第四十一章规定，中学教员需在25岁以上，无大学毕业证书者不得任教。第四十二章规定，无学士学位者不得担任大学教员。四十八至五十一章是有关考试的规定。五十二至五十七章是有关学生缴纳学费的规定，如第五十二章规定，学生如缴纳学费有困难者，可以借贷，但学成后要分期偿还或出具保证书，以为官方义务供职的方式偿还（离校5年后分期偿还，如因病死亡则免还），这就给贫困学生上学提供了经费的保障，有利于普及教育的开展。八十九至一百零九章就有关教育经费的来源、开支作了详细规定。如第九十章规定，要普及教育，一切人民都应上学，国家赞助的经费一定要用之于民，决不能对某个阶级有所偏重。第九十四章规定，大学学生的学费每月7.50日元，此外还有6.00日元、4.00日元的。中学每月5.50日元，此外还有2.50日元、2.00日元的，小学每月0.50日元，此外还有0.25日元的。这个学制总计二百一十三章，对学校教育的有关事

项做了全面规定，是一个庞大的国民教育计划，其中的学区制和学校体系主要是模仿法国的教育制度，而在教学科目和教学内容方面却主要借鉴了美国的教育。《学制令》在创建日本近代学校制度和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方面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尤其对普及初等教育是有其实际意义的。但是《学制令》也存在着照抄照搬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教育体制的弊病，不适应当时日本的国情和国力，因此在1879年被废止，被《教育令》所替代。《教育令》共四十七条，对学校种类、学科设置、学校设备和学校管理等做了简要规定。教育行政管理权由中央放给地方。《教育令》在各个方面都比《学制令》灵活得多，富有资本主义自由化色彩，但《教育令》模仿了美国教育行政管理的模式，不符合日本中央集权制的国家管理体制和过于自由化，因而1880年被修改。同年12月重新颁布修改的《教育令》，它否定了人民参与教育行政管理的权力，强调国家对教育的干涉，加强中央及地方对教育的监督管理。

明治维新新式学制的价值的确立与洋务教育对传统教育的改造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洋务教育改革不涉及封建的政体，而明治政府颁布的学制是解放贱民，废除封建等级身份制，这一举措扫清了传统体制对新式教育发展的障碍，消除了新旧体制间的摩擦，为新式学制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中国于1904年才颁布新学制，比日本晚了三十多年，且新学制的颁布是清政府在危机意识的支配下而匆匆忙忙颁布的，因此，在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出现决策不当，忽视质量和急于求成的特点。虽然明治时期的教育改革也是在危机意识的支配下进行的，但与中国不同的是明治政府把教育改革摆到重要的位置，然后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改革，使教育很好的为经济建设服务。

#### 四、改革所得到的不同结果

洋务教育改革以“师夷长技以治夷”为改革目的，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这充分说明了其是封建官僚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而在局部范围进行的一场自救，其没有涉及封建统治的根基，因而没有在全国形成自上而下的教育变革，没有形成完备的教育体制，因此其改革注定是要失败的。时人孙家鼎痛切的陈述，同文馆的成果“充其量得数十翻译人才而止，福州船政学堂、江南制造局学堂以及南北洋水师学堂，皆于一才一艺，故办理垂数十年欲求一缓急可恃人才而竟不可得者”。<sup>[9]</sup>光绪二十二年，李端棻在《请推广学校折》所言更是一语中的，他说三十多年来，洋务学堂之设不可不谓之不

多，而不能得一奇才异能之奇士用，“徒习西语西文，而于治国之道，富强之源，一切要书多未肆及”。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的战败更是暴露了洋务教育的弊端，给洋务教育改革画上了句号。

日本明治维新教育改革是以“文明开化”为改革目的，以“和魂洋才”为指导思想，以《学制令》为制度保障在全国开展的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的教育改革，它使日本的教育走向了近代化，使日本走向了强大。明治维新教育改革重视对儿童文化教育，使得小学入学率迅速上升。1873年，小学入学率为28.1%，1899年达到70%，1905年达到96%。1907年，虽然把义务教育年限延长到六年，入学率并没有因此下降，而是上升到98%，1925年，更达到99%，几乎是百分之百。小学教育的普及，使得日本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和素质普遍提高。明治维新教育改革使日本迅速普及了初等教育，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大批有文化、能掌握近代科学技术的劳动力，使得生产劳动年龄人口的学历构成发生了变化，这些新增加到生产第一线掌握一定技术的年青工人，能较快地适应新技术条件，提高劳动生产效率。高等教育的建设和发展，为当时社会培养和造就了大批科技人才和高级管理人才，同时为资产阶级先进的思想传播起了推动作用。但同时也由于其是自上而下的教育改革，因此1890年，日本天皇下达《教育敕语》，作为军国主义的教育法规，规定日本的教育目的是教育臣民“重国宪”、“遵国法”、“义勇奉公，以辅佐天壤无穷之皇

运”。<sup>[10]</sup>这种军国主义教育，宣扬“大和魂”、武士道、儒教的伦理道德，以树立天皇神权为中心的皇权主义，法西斯主义等，阻碍了日本教育的正常发展，给日本人民和亚洲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 参考文献：

- [1]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516.
- [2]曾文正公手书日记[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0. 123.
- [3]堀尾辉久.日本教育思想[M].山西:山西教育出版社, 1988.21.
- [4]堀尾辉久.日本教育思想[M].山西:山西教育出版社, 1988.22.
- [5]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十四[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6.65.
- [6]劝学篇.外篇[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7.81.
- [7]堀尾辉久.日本教育思想.山西:山西教育出版社, 1988.54.
- [8]王符.教育与日本现代化——日本正、反两方面教育改革经验探讨[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 16(3).
- [9]孙家鼎.遵议开办京师大学堂折.
- [10]李永连,张有栋.日本教育法规选编[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7.

[责任编辑：董珉]

## Comparison of Foreign Affair Education with Meiji Education

HU Mao-bo HUANG Ji

(Education Science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

(Wuhan East Lake High School, Wuhan 430071, China)

**Abstract :** This paper compares Foreign Affair Education with Meiji Education on the purpose, guidelines of the reform and the system formed in order to probe into the reason for different results of two countries' reform, which could be taken as reference for the reforming of education in china.

**Ked words :** Foreign Affair education; Meiji education; education reform; Comparison